读史札记

清代穆克登碑初立位置及图们江正源考论*

陈　慧

1712 年 (清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穆克登第二次前往中朝边境，勘查图们江界河。在朝方的协助下，穆克登确认了图们江和鸭绿江的正源，在此二江的分水岭上立下一座简陋的石碑，用以标示中朝界河发源于该处。碑文曰：“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①]。这次踏查，是中朝两国对图们江界河源头所进行的首次勘查，双方共同对图们江正源进行了确认。自此，中朝两国政府尚未加以约定的图们江上游地段的边界线得以明确。穆克登寻源、立碑，是中朝边界史上的重要举措。

19 世纪末，朝鲜就穆克登所立之碑，向清王朝提出了图们江界河争议。继而，穆克登查边史事又衍生了系列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穆克登将碑立于了何处，图们江正源为何水？20 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至今争议颇多。学术界对此大致有两种不同见解。一是认为石碑的初立位置即失踪前所在位置，位于长白山天池东南，后世从未有过挪移。日、韩学界普遍持此观点[②]，中国学界以杨昭全、张存武先生为代表。[③]在此基础上，关于石碑所指示的“土门”为何水这一点上存在分歧。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土门”即今图们江，碑东之水是图们江源头之一；日、韩学界则多认为，碑东之水非图们江，“土门”是松花江上源之一的黄花松沟子或其他河流。另一种看法是认为石碑最初立于今朝鲜境内的小白山 (小白山是图们江与鸭绿江的分水岭) 上，后来被向北挪移到了天池附近；碑东所对的“土门”江即图们江，正源是小红丹水。这一观点主要存在于中国学界，以清末戍边将领吴禄贞、当代学者徐德源先生为代表。[④]

穆克登确定界河正源并立碑为记，实质上就是对中朝图们江、鸭绿江界河发源地段进行划分。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和石碑所标示的界河正源，直接决定着中朝两国边界线的定位。廓清穆克登碑的初立位置及图们江正源，是解读中朝图们江边界争议案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对于认识和分析清代的中朝关系以及古代中朝两国边界的沿革过程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在有些人提出“中日《间岛协约》无效、应使中朝边界线回到 1909 年之前的状态”等观点之后，对于穆克登立碑位置和图们江正源的研究就更加重要起来。

就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和石碑所标示的界河正源等问题开展研究，首要的困难在于史料记载的模糊与不详。中国史料对于穆克登查边事件的记载极为有限。在朝鲜史料中，《朝鲜王朝实录》、《北征录》、《万机要览》等载有穆克登查边的经过。但是，由于穆克登查边前，朝鲜的北部边界仅限于今朝鲜两江道甲山郡为止，长白山南、北地域虽归属于清王朝，但清政府却严禁百姓涉足，以至于当时长白山脉的

[**收稿日期**] 2008 - 11 - 15
[**作者简介**] 陈慧 (1975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72

诸多山峰与河流均未被命名。所以，史料中对于立碑的位置和石碑所对的界河源头的记载很不明确。对于穆克登所勘之图们江众源头，由北到南，仅以“初派”、“次派”、“第三派”、“第四派”等记之；关于立碑的位置则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记录纷繁的史料逐一加以分析，对于考证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和石碑所标示的界河正源等问题显然是最为关键的。本文拟以朝鲜史料为依据，透过对若干史实的梳理，深入考察穆克登立碑的位置和石碑所标示的界河正源等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并推动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

一、从蔡震龟杜撰“真豆江”事件考察图们江正源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穆克登找到图们江和鸭绿江的正源，并于二水发源地附近立下石碑。之后，沿碑东之水向东北行，与等候于临江台的朝鲜接伴使朴权会合。在临江台驿站，朴权对穆克登所勘定的图们江源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双方进行了讨论，结果肯定了穆克登确定的碑东之水确为图们江正源。事件经过如下：

朝鲜茂山居民蔡震龟等向朴权反映，穆克登所定之水（以下简称“穆源”）不是真正的豆满江源，“穆源”以北数里处另有一条东流之水，是“真豆江”（以下简称“蔡源”）。于是朴权便向穆克登提出：“临江台近处有一水来合于大红丹水，明是白山东流之水，此是真豆江；而大人所得之水，乃大红丹水上流云…临江台上边来合之水，此地之人皆称为豆江，自此相距不过十余里……大人既奉皇旨查明边界，而误认大红丹指为豆江，而至于真豆江之来合于不远之地者不为一见，恐有乘于奉使审慎之道。”[⑤]穆克登则拿出朝鲜所绘制的地图，“一一指示曰，我与鲜人在山时详察形势，下山后遍寻水源，此水之外实无他水”，指出蔡震龟谓之“真豆江”是清王朝的内河，“似是大国地方众水合流来会于此者也”[⑥]。随同穆克登寻源、立碑的朝鲜官员也一致认同“蔡源”不可能是豆满江正源：“随往总管之差员、军官、译官等皆言，断流处百余里之内无不遍踏，而此水之外更无他水云。临江台来合之水，则总管所谓大国山谷之水，来会于此云者，似为近理。”朴权便托词“当初震龟亦称其闻知于猎夫，而非渠目见之事也”[⑦]，此事即告结束。

七月，蔡震龟以越界占地、垦种之罪被朝鲜政府逮捕。

蔡震龟被拿获后，朝鲜咸镜道监司李善溥对其罪状陈述如下：“震龟入居朴下川，彼我境界无不通晓。而私率地师占地求山于彼边，实是乱民伎俩。又在莫重定界之时，作出大红丹、真豆江之说，以其占山之处为若在于豆江之内，称为我境者然。而今，此定界时审定豆江之水源，则其所占地处为豆江之外，实状现著矣。”[⑧]朝鲜领议政徐宗泰奏曰：“茂山人蔡震龟，私率地师占地于豆满江越边，事虽未成，罪则甚重。”[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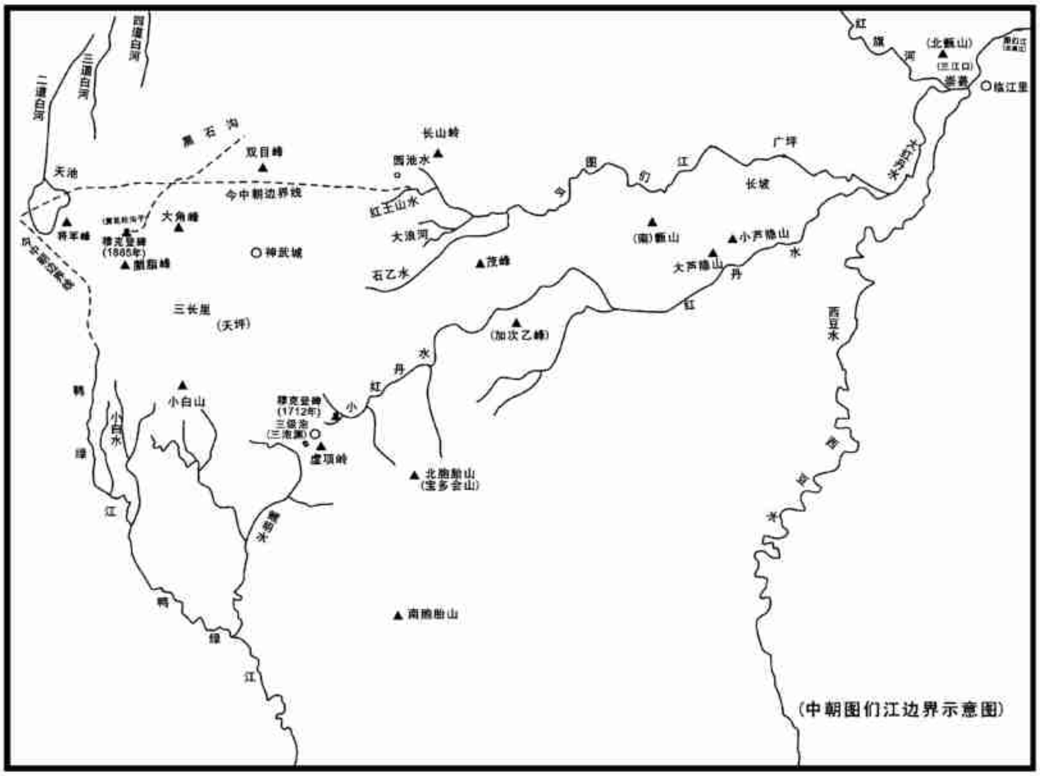
分析上述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蔡震龟率众在国界线以北越境垦种。穆克登定下图们江正源之后，蔡等所占之地尚位于穆克登所定的正源以北，占垦的土地仍处于清王朝境内。为了达到侵占已越垦土地的目的，蔡震龟便另提出一条更北方的水流，欲引导穆克登将界河正源北移，期望其越垦之地会被囊括于朝鲜界内，于是杜撰了“真正的豆满江源在穆克登所定水源以北”的谎言，汇报于朴权，企图误导穆克登把清王朝的内河定为图们江正源，但未获成功。

考察蔡震龟事件，可以推断，穆克登所定的图们江正源应为小红丹水源头。

查边当时，只有流量较大的河流——红丹水和西豆水（当时称为鱼润江）有命名，1885年中朝第一次勘界时才出现了红土山水和石乙水等称谓。图们江各源头由北到南依次为：红土山水（发源于红土山东南）、石乙水（发源于长白山之东南）、红丹水（发源于小白山正东的三汲泡东南，根据水流量不同，各河段有小、中、大之分称）、西豆水。其中，红土山水、石乙水、小红丹水分别是大红丹水的上源分支；另有红旗河从中国境内流出，向南流与大红丹水交汇。对照以上各水，对“穆源”和“蔡源”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据上文史料可知，“蔡源”位于“穆源”

以北，汇入大红丹水，且处于大红丹水与鱼润江（即今朝鲜境内的西豆水）合流处的上游，为“东流之水”；“穆源”也是大红丹水之源，向东流，汇入大红丹水。



(中朝图们江边界示意图)

（一）“蔡源”不是红旗河

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蔡源”是红旗河，[10]但笔者认为，该水不会是红旗河，也绝无可能是红旗河以北之水。

首先，从距离上考察，“蔡源”不是红旗河。

争议发生于临江台驿站。朴权言称，该水距离驿站不过十余里。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临江台位于“茂山以西七十里，又十里为鱼润江”[11]；据《增补文献备考》记载，临江台距茂山五十里。[12]据清代乾隆中叶时朝鲜所绘地图，临江台位于豆满江南岸、鱼润江东；据清乾隆五十年所绘地图，临江台在鱼润江东岸，距豆满江稍远。[13]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对临江台的位置作出判断。临江台驿站应设于鱼润江（即西豆水）畔，是西豆水的下游河段与大红丹水交汇处附近。因为穆克登勘定图们江正源后会顺流而下，进而勘查整条图们江界河，接着会去往茂山方向，继续完成从惠山至茂山地段的勘查任务。[14]但穆克登究竟会确定哪一条水源为图们江的正源并沿流而下，先行至前方迎候的朴权等人并不知晓，那么驿站一定设在不会与穆克登错过的地方。并且，朴权等先往茂山地区时，从发源于小白山正东之三汲泡的小红丹水流域出发，一路经过红丹水的小、中、大各个河段，过大红丹水后方渡过鱼润江，到达临江台驿站。[15]所以，此临江台驿站应该于今西豆水入图们江口附近。

在西豆水入江点以东不远处，今朝鲜境内有“临江里”，位于西豆水东岸。[16]对照上文史料，当年之临江台应当就是此地左右。由“蔡源”在临江台附近汇入大红丹水，是“临江台上边来合之水”，“自此相距不过十余里”[17]，可知“蔡源”汇入大红丹水处相距今西豆水入图们江口约为十余里。

但红旗河却是由中国境内流出，自北向南与大红丹水汇流，入江点距西豆水仅为二里。

据《东三省纪略》，红旗河汇入图们江后流二里，有西豆水汇入。[18]据吴禄贞勘查，“（红旗河）出于老岭……至三江口西，入于江。又东流二里，至三江口，西豆水来汇，韩人亦称之为鱼润江”[19]。蔡震龟提出所谓的“真豆江”后欲带领穆克登前去查看，“十余

里”的说法应该是真实的。蔡震龟为当地居民，“二里”与“十余里”的距离应该不会弄错。所以，从这一点考察，“蔡源”不是红旗河。

其次，从河水的流向和流量上考察。红旗河虽发源于长白山东北麓，但发源后绕向中国境内，迂回后又自北向南流，汇入图们江，而“蔡源”“明是白山东流之水”、“又有白山东边发源之水，或流或断，来合于鱼润江及大红丹水”[20]，“东流”显然与红旗河入江时的流向相矛盾。并且，据实地考查，红旗河汇入图们江之前，相当长河段的流量、流向都比较稳定，并非“或流或断”。

第三，从河干的组成来考察。穆克登曾依据地图指出，“蔡源”是众水合流而成。而红旗河汇入图们江之前的几十里河段都甚为清晰，并非“众水合流”汇聚而成。

另外，从主观上分析，即便朝鲜向北展拓土地的愿望再强烈，在当时的局势下，也不会胆大到欲以红旗河与中国划界。因为红旗河从中国境内流出是显而易见的，红旗河汇入图们江之前的 50 多公里河段的流向都是由北向南，在中国境内穿行。如果以红旗河划界，则包括整个长白山在内的至少今中国吉林省和龙县的一半领土都将划入朝鲜界内，作为当时明知“白头山属于女真”[21]，对甲山以北、长白山以南的地域都没有把握获得的朝鲜，是不应该有这种设想的。

综上所述，基本上可以排除“蔡源”是红旗河的可能性。“蔡源”应该是红旗河以南的图们江源。

（二）“穆源”应为小红丹水

“蔡源”位于“穆源”之北数里外，是大红丹水源头之一，但不是红旗河。按照对朝鲜分界的有利程度，“蔡源”由北向南依次可能为红土山水、石乙水、小红丹水。

从“穆源”之北有“蔡源”这一特点分析，作为图们江最北源头的红土山水，由于其北再无图们江上源支流，所以红土山水不可能是“穆源”，只有可能是“蔡源”。相应地，“穆源”就可能是小红丹水或者石乙水，蔡震龟占垦的中国土地位于红土山水与石乙水或小红丹水之间。

再考察“穆源”的流程。根据朝鲜许樑所说，“当初彼我人沿流而下，自即今设标处，下至大红丹各二日半程。”[22]即，从立碑处起，沿“穆源”而下，到大红丹河段需要两天半。而石乙水从发源处到与红丹水相汇处，仅一百一十六里，[23]红土水的流程与此相仿。如果“穆源”是红土山水或石乙水，穆克登将碑立于红土山水或石乙水的发源处，其一百余里的路程是不足以走两天半的。而小红丹水的流程则远远长于以上二水，并且途中的山路更多。从这一情况考察，“穆源”是小红丹水的可能性要大于红土山水和石乙水。

另外，从“穆源”与鸭绿江源的关系来考察，亦可排除“穆源”为红土山水和石乙水的可能性。碑东之“穆源”位于“白山东边最下处”[24]，碑西不远处有鸭绿江源与图们江正源西、东遥相呼应。对照红土山水、石乙水的发源地，首先不符合“白山东边最下处”；其次，此二水的发源处附近亦无鸭绿江源。所以，“穆源”应该不是红土山水和石乙水。

再考察小红丹水发源处——小白山三汲泡，可以发现，作为图们江与鸭绿江之分水岭的小白山的地势与上述记载相符。

穆克登立碑过程如下：于“白山”上找到图们江源头“初派”的一小段上源，不远后即成为伏流。于山下见到“初派”的下游“涌出处”，与向东北方向流的“次派”交汇。二水汇流处是“次派”自发源地流出约九、十里的位置。该合流水，即为图们江正源。距二水汇合处不远，有水西流，是为鸭绿江源，与此图们江正源相对。穆克登见此情形，曰：“此水一东一西，分为两江，名为分水岭可也。”[25]于是，便在分水岭上，即合流处附近立碑。

据吴禄贞勘查，“红丹水出于小白山正东之三汲泡，西北距长白山峰六十里余，水东北伏流八里，有泉涌出，是为红丹水之源。自泉源涌出东北流七里余，有一小水来汇。此水自发源北流五里余入汇。又东北流二里余，有一小水来汇。此水自处西北流五里余入汇。”[26]

显而易见，吴禄贞所见之情形与穆克登所查之“次派”和“初派下游”的特点是吻合的。其中，“次派”对应发源于三汲泡的“红丹水之源”，“初派下游”与“有一小水来汇”

对应。并且，三汲泡以西地段亦有鸭绿江源。由此可推知，“穆源”应为小红丹水。

二、从南甑山和庐隐东山的位置考察穆克登所勘水源

判断“穆源”，南甑山和芦（庐）隐东（洞）山的位置不可忽视。

据《北征录》记载，穆克登之行立碑后，“自白山水源沿流而下，到南甑山，由芦隐东山之路，今方躯来云……总管与我国诸人，同在山顶审察既详，往来山底寻觅且遍，而此水之外，东北边百余里内，则更无他水，故一行皆以此为豆江之源，沿流而下矣。南甑山以后，则江边路径极险且绝，不能接足，故出来于芦隐东山大路以行云云。”[27]“仍为沿流而下，过庐隐东山，来会于鱼润江使臣待候处。”[28]

如果说穆克登等自立碑处行程近百里后到达南甑山地区，又过芦隐东山，那么“穆源”必为小红丹水。

穆克登查边前，除《朝鲜王朝实录》肃宗朝纪事之外，文献中罕见“南甑山”，只有关于甑山的记载：“（甑山）发自小白山，在小白偏东百八十里。山南为红丹水，北为石乙水，此支脉即止于石乙、红丹二水之间”[29]，“与小白山一脉相延”[30]。据《北征录》描述，南甑山临近芦隐东山，山边有大红丹水支源流经，与甑山方位相符，南甑山应为甑山山脉中南侧的一支。

穆克登“延流寻去，则其水未合于南甑山近处，此乃会前宋太先等所谓三派涌出处北距二十余里之地也”[31]。按照穆克登“沿江源而下，至南甑山地区，至芦隐东山”的行走路线，对照上图，除石乙水、小红丹水之外，沿着其他任何水流的流向而下，都不是过南甑山、至芦隐东山的走向，“穆源”只能是石乙水或小红丹水。

再考察石乙水和小红丹水的走向，小红丹流经甑山地区时从甑山山脉南侧较远处流向东北方；石乙水则紧贴着甑山而过：“由小红丹纡曲向西，绕过长坡，复折而南，紧贴甑山，经过石乙、红土汇流处，向西南行，折向西有一水沟，沟尽处接黄花松甸子，向西五里复接一沟，向西北行二十二里，至小白山东麓。”[32]对照“穆源”“未合于南甑山近处”的特点，这条水流应该不是石乙水，而更可能是小红丹水的下游河段。

三、从分水岭考察图们江正源及穆碑位置

据朝鲜史料记载，图们江正源并非发源于长白山上。

1691年（清康熙三十年，朝鲜肃宗十七年），清廷曾派遣图纳、查山等往鸭绿江、图们江地区核实地志资料，由于对地形不熟，清廷要求朝鲜适当给予援助。朝方最初拟定的向导路线是自惠山起，经云宠至吉州，再转茂山方向，但咸镜道监司建议：“自惠山由柏德岭过芦隐东山至茂山不过三、四日程，而路不甚险，且处于白头之南、长白之北，正是豆满江上流。”[33]1712年，右议政赵相愚向肃宗王禀奏如何接待穆克登时提到：“白头、长白两山间有甫多会山分水岭……而彼如欲由云宠直上白山、转下豆满江，则甫多会山不必开路。”[34]过此分水岭后，“至茂山境前有鱼润江”[35]。

甫多会山分水岭，即今胞胎山，当时又称柏德岭，亦简称甫多会、宝髢、宝多会山，清方称之为蒲潭山、胞胎山。

据以上史料可知：其一，过甫多会山后即庐隐东山，过庐隐东山后即鱼润江，由此路至茂山更为便捷。其二，“白头”是指今之长白山，“长白”则是位于长白山以南的另一座山；豆满江发源于此二山之间，而不是白头山上；其三，“由柏德岭过芦隐东山”也当指这一片地域，“穆源”位于甫多会山分水岭与庐隐东山之间。

甫多会山分水岭与庐隐东山的位置在史料中记载不多。唐维尔地图中有“Yoro-tum chan”（庐隐东山的韩语发音），乾隆内府舆图作诺罗东山。在朝鲜早期文献中，除《朝鲜王朝实录》肃宗朝纪事之外，未曾见“南甑山”之名，唐维尔及内府舆图中也只有甑山，位于“Toumen oula”（土门乌拉）之南，“南甑山”应当就是此甑山；乾隆朝时，朝鲜所绘制的两

幅茂山图也将其置于同样的位置，庐隐东山位于大红丹水以北，甑山之南。[36]朝鲜绘制于1864年的《大东舆地图》上，虚项岭、芦隐山、甫多会山呈倒三角形，其中，虚项岭、芦隐山在北，甫多会山在南。芦隐山位于虚项岭东北侧，甫多会山作为倒三角形的顶点位于虚项岭南侧，稍偏东。以甫多会山为起点，南甑山在芦隐山之北，稍偏西。小红丹水发源于虚项岭，由五、六条支流汇成，位于该倒三角形之内，沿虚项岭至庐隐山的方向向东北流去，紧贴庐隐山边流过。地图上可见，在这一段的流程中，仍有多条小水流从不同方向汇入。根据各水的走向来看，穆克登沿流而下经过了庐隐东山，所沿之水只能是小红丹水。

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绘制于康熙朝的满文宁古塔图，所标之图们江源亦为红丹水。[37]

综合以上信息，笔者认为，穆克登勘定的图们江正源是小红丹水。尽管这一推断也不能与所有史料严格相符，但是，小红丹水被定为图们江正源的合理性要远大于红土山水和石乙水。

由此便可以推断出穆克登立碑的位置。穆克登将碑立于图们江的“初派”下游与“次派”的交汇处。以“次派”为主干的图们江正源是小红丹水，发源于小白山正东之三汲泡。所以，小红丹水发源后流出约九、十里的位置，即穆克登立碑之处。与图们江正源遥相呼应的，是由三汲泡西南行，顺该岭而下约三、四十里处的水流，该水向西南流，汇入鸭绿江，被穆克登定为鸭绿江正源。[38]

如上所述，穆克登查边后于小白山分水岭立碑，碑文虽刻以“审视”字样，但实际上起到了分界的作用。它表示，两国界河的发源地带应以此碑所确定的图们江和鸭绿江正源之连线来划分国界。

穆克登查边前，“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内涵，指的是图们江中、下游流域地区以图们江的主河段为大致的界限；图们江的上游（今吉林省和龙县崇善以西河段）是由西豆水、大红丹水、石乙水以及红旗河等支流汇聚而成，该地段的界线尚未划分。

当时，朝鲜北部疆域的实际控制线远在今朝鲜甲山一带，甲山以北的地域本不归属于朝鲜。穆克登抵朝之前，朝鲜都提调李颐命奏肃宗王曰：“白头山距甲山六、七日程，而人迹不通，故我国镇堡把守皆在山南五、六日程。《大明一统志》以白头山属于女真，彼或以我国把守处为界，则事甚难处。”朴权奏曰：“白头山南空旷处，我国人民不为入接，彼若指其处谓其界内，则无文籍可据而争者。”[39]尽管如此，朝鲜事先还是制定了“依照两国的界河鸭绿江、图们江之江源，以水源横截为限，将陆地一分为二，横截线以北为清境，以南为朝鲜境”的方案，将获得甲山以北、图们江以南的地域作为目标。[40]查边时，金指南虽称“大池以南是朝鲜领土”，却极为忐忑，认为其子金庆门陪同穆克登是“涉险”，[41]以哭泣、跪求博得穆克登的同情，并用计多赚取了鸭绿江西北源头和南源之间的一座山。[42]穆克登亦清楚“尔国之多得地方为幸”[43]。

朝鲜认可本国于查边中受益。领议政徐宗泰于朝堂坦言：“定界后，疆域增拓，诚为幸矣。”[44]肃宗王特意向康熙帝呈上《谢定界表》：“审界结果，幸逾始望，感激中情，将益笃忠贞，思陨结之报，并恒尊定制。”[45]

穆克登查边使得中朝边界线得以规范，中朝图们江、鸭绿江界河的上游地段开始有了明确的标识，此二江发源地段的陆地部分始明确划分。穆克登碑作为中心点，将图们江和鸭绿江的正源东西相连。自此，穆克登立碑处以南地域开始成为朝鲜的领土。其中，图们江上游地段以小红丹水分界，小红丹水东北之地归属于清王朝，西南归属于朝鲜。从此，小白山分水岭至甲山之间的疆域被正式划归朝鲜，图们江和鸭绿江由此前大致上的“习惯界河”开始成为较为清晰的边界线。

＊本课题基金项目：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9CZS033）；韩国中央研究院2008年课题(AKS-2008-R-507)。

①(朝鲜王朝) 金指南：《北征录》，五月十五日条。

②参考（日）篠田治策：《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日本昭和十三年（1938）；（韩）《韩国的北方领土》，白山资料院，1998年；（韩）《白头山定界碑与间岛领有权》，白山资料院，2001年1月。

③参考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87、196页；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穆克登所定的中韩国界》，见于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④参考（清）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
⑤⑦⑰㉗㉛《北征录》，五月二十一日条。
⑥(朝鲜王朝)《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壬辰六月三日条。
⑧(朝鲜王朝)《承政院日记》，肃宗三十八年壬辰七月二十日条。
⑨《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壬辰七月二十日条。
⑩杨昭全、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和张存武的《穆克登所定的中韩国界》中，均认为此水为今红旗河。
⑪《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九年。
⑫(朝鲜王朝)《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十九，第13页。
⑬㊱㊲转引自：《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212页，第212—213页。
⑭《北征录》，五月二十八日条。
⑮《北征录》，五月十二日条。
⑯《朝鲜 韩国地图册》，咸镜道，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1999年1月，第8页。
⑱徐曦：《东三省纪略》之 图们江。
⑲《延吉边务报告》，第40页。
⑳《北征录》，五月十六日条。
㉑《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丁亥三月四日条。
㉒《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条。
㉓《延吉边务报告》，第39—40页。
㉔《北征录》，五月十五日条。
㉕《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壬辰五月二十三日条。
㉖㉙㉜《延吉边务报告》，第39页，第37页，第88页。
㉘《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条。
㉙《延吉边务报告》，第37页。
㉚(清)张凤台著：《长白汇征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68页。
㉝《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十八年壬申二月丁酉条。
㉞《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丁亥三月四日条。
㉟(朝鲜王朝)《备边司誊录》，第六册，第363页。
㊳(朝鲜王朝)《照会誊抄》，(韩)陆洛现编：《间岛领有权关系资料集2》，白山文化，1991年，第460页。
㊴《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丁亥三月四日条。
㊵《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三月四日条。
㊶《北征录》，五月十七日条。
㊷《北征录》，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条。
㊸《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条。
㊹《承政院日记》册二十五，第478页。
㊺《承政院日记》册25，第478页；(朝鲜王朝)《同文汇考》原编，卷48 疆界，谢定界表。